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带一路”研究系列

智库报告

“一带一路”： 定位、内涵及需要 优先处理的关系

"One Belt One Road":
Orientations, Contents
And Challenges

李向阳◎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带一路”：定位、内涵及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 李向阳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5（2015.8重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系列·智库报告）

ISBN 978-7-5097-7509-7

I. ①一… II. ①李… III. ①区域经济合作-国际合作-研究

- 中国 IV. ①F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1153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系列·智库报告

“一带一路”：定位、内涵及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著 者 / 李向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王丽影 王晓卿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 字 数：36千字

版 次 /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509-7

定 价 / 8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自从习近平主席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内外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2015 年 3 月中国政府颁布《推动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进入了实施阶段。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围绕“一带一路”存在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最受人关注：“一带一路”是什么？“一带一路”能否做到可持续？本报告试图按照下述逻辑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背景出发，探讨“一带一路”的定位、内涵及建设“一带一路”所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我们认为，不同于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的区域合作经济机制。对内它体现了中国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诉求，并为实施经济外交、周边战略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托和平台；对外它有可能成为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一个新途径。它所基于的“亲诚惠容”理念是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方向一致的。但是，建设“一带一路”将会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优先处理一系列的关系，

这包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的关系、利用现有比较优势与开发新优势的关系、利益索取与利益让渡的关系、机制化合作与非机制化合作的关系、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等。处理好这些关系对“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与可持续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

“一带一路”再平衡 / 001

- 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世界意义 / 002
- 二 外部世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
认知和反应 / 003
- 三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 007
- 四 “一带一路”是适应中国和平崛起需要与
外部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 / 012

第二章 “一带一路”的基本定位 / 015

第三章 “一带一路”的内涵与特征 / 021

- 一 “一带一路”继承了古丝绸之路的合作、
共赢理念，以运输通道为纽带把众多国家
和地区联系起来 / 021
- 二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互联互通将成为
“一带一路”的基础 / 022
- 三 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实施多元化的合作
机制是它的重要特征 / 023
- 四 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
体将成为“一带一路”的目标 / 025

第四章 建设“一带一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 027

- 一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 027
- 二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029
- 三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 031
- 四 经济合作与非经济合作的关系 / 034
- 五 充分利用现有比较优势与开发新优势的关系 / 035
- 六 机制化合作与非机制化合作的关系 / 037

第一章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一带一路”

伴随中国政府正式公布《推动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①“一带一路”即将进入实施阶段，但围绕“一带一路”的提出背景、动机、载体、内涵、特征，在国内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和误区，在国外还存在诸多质疑。更重要的是，作为涵盖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一带一路”的实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将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认为，对“一带一路”的认识首先应该置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之下，进而构建既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又能为国际社会所接纳的理念、目标和合作机制。

走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道路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作为“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平崛起是必由之

^①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 年 3 月 29 日。

路。把和平崛起的理念付诸实践，对内需要推动改革开放，对外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世界各国一道建设合作、共赢、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带一路”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要求。正如《愿景与行动》所宣称的：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①

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世界意义

经过 30 余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2014 年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发布报告，宣称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衡量，2014 年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这引发了国内外激烈的争论。使用购买力平价法衡量一国 GDP 在统计学上并无不妥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客观地衡量一国的经济规模。在使用购买力平价法衡量一国 GDP 时最核心的问题是对生活成本的评估。以世界银行发布的结果为例，在该国际比较计划 2005 年的评估中，对中国生活成本的评估被认为高估了 20%。换言之，这一次由于对中国生活成本指标的评估下调，中国与美国经济规模的差距无形中就缩

^①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 年 3 月 29 日。

小了，超越美国的时间从 2019 年提前到了 2014 年。在这一争论中，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待经济规模总量指标，内部与外部的关注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外部世界更关注总量指标，因为在外部世界看来，经济规模总量大意味着有更大的市场需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等。而本国公众更在意人均指标，比如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人均住房面积、人均汽车拥有量等。^①

无论中国经济规模是否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并没有改变。按照人均 GDP 指标，中国的排名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未富先大”已成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特征，这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是独有的。在中国人自己还没有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外部已经把中国看成一个世界大国。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已不再是单纯的国内问题，而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国际问题。

二 外部世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和反应

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反应是复杂的。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总体上是担忧。除了少数人炒作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②，主流阶层主要担忧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或规则。这在国际经济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2010 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出版了题为《日蚀：生活在中国支配下的世界》（简称《日

① 李向阳：《理性看待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一》，《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8 日。

②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蚀》)一书。尽管该书是一本严肃的经济学著作,探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方向,但作者在序言中使用科幻小说的笔法描述了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的情形。^①如果说《日蚀》反映的是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那么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发布的对全球格局进行预测的展望报告,该报告定期发布则更加明确地预测了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分布。^②该预测报告一经发布很快就成为西方众多研究机构判断未来世界格局变化方向的基础。依照这一预测,以传统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GDP、人口、军事支出、技术)来衡量,203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将会超越美国。如果在传统指标体系基础上加入健康、教育、治理等指标,那么中国在全球综合国力中的份额将会比预期的低4~5个百分点,中国综合国力超越美国会推迟到2045年。无论采用哪一种衡量指标,21世纪上半期中国综合国力都将成为世界第一。这是美国及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以来面临的第一次挑战也是最大的挑战。

针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三种:

第一,引导中国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把中国纳入现行的国际体系之内,先促使中国的经济体制而后是政治体制向西方体制转变。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时,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以至于当时还出现了所谓“中美共治”(G2)的倡议。随着中国“入世”的十年过渡期结束,西方国家对这一选择失去了信心。它们认为,中国并没有按照它们所期

① Avind Subramanian,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ttp://www.piie.com>.

②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http://www.dni.gov/nic/globaltrends>.

望的方式向西方体制转变，而是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与西方自称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相对应）。更重要的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①它们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在规则面前推行“实用主义”（有利于自己的遵守，不利于自己的不遵守）。总之，把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之内的做法行不通了。

第二，把中国排除在外，另起炉灶重新制定新的国际经济规则。既然通过多边贸易体制把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之内的做法行不通，那么以组建自由贸易区为平台制定新规则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近年来，美国推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②

第三，扰乱中国的周边环境，削弱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影响力。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需要有一个稳定、繁荣、友好的周边环境，而西方世界把中国的和平崛起看成中国首先要主导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因此，无论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与此相关的 TPP 都有应对中国崛起的动机，尽管美国官方不承认这一点。在国内学术界，谈到美国自贸区战略目标时，很多中国学者把它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动机，否定非经济动机（甚至把考虑非经济因素等同于阴谋论），比如，分享亚洲高速增长的收益、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之间的“抱团取暖”、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等。毫无疑问，这些动机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假如忽略

① “Special Report: State Capitalism,” *Economists*, January 21st, 2012.

② 李向阳：《如何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体系约束》，《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4期。

了非经济动机，我们就有可能对美国的自贸区战略做出错误的判断。事实上，美国官方与学界从来没有否认过其自贸区战略非经济动机的存在。按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USTR）2003 年选择自贸区伙伴的标准，选择伙伴时至少有六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一是遵守贸易规则的政治意愿与能力；二是能给美国带来的经济收益；三是对美国全球贸易政策的支持程度；四是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及安全利益相匹配；五是要得到国会与私人部门的支持；六是受美国的贸易谈判资源约束。当然，不同时期美国自贸区战略目标的选择会有变化，比如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曾经把反恐作为选择自贸区谈判伙伴的标准之一，美国与美洲国家进行自贸区谈判时引入了民主化标准，但无论怎么变，有一点是确定的：美国从来就不是为了实现单一的经济目标。^① 2015 年 1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了获得国会授予其“快车道”谈判权（TPA），在国情咨文讲话中明确强调：“中国希望为目前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制定游戏规则。这将使我们的工人和企业置不利之地。我们怎么能让事情这样发展？这些规则应当由我们来定。我们应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两党赋予我促进贸易的权力，来保护美国工人，与从亚洲到欧洲的国家签订新的贸易协定，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而且是公平贸易。”^②

① 李向阳：《美国自贸区战略的发展方向》，《光明日报》2014 年 1 月 14 日。

② “Obama’s 2015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5/01/20/full-text-obama-2015-state-of-the-union/22064089/> 2015 年 4 月 17 日，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代表弗罗曼访日前的记者会上也做出了类似的表态：“如果我们制定不出在亚洲能够竞争的规则，中国就会制定出有利于自己劳动者和产业的规则。”《日美 TPP 谈判在最后关口》，《日本经济新闻》2015 年 4 月 21 日。

三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①

良好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其中周边经济环境又是至关重要的。高速增长使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也成为亚洲绝大多数经济体中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甚至是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反过来，周边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然而，伴随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周边国家正在出现“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趋势。特别是 TPP 的出现，使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如何应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变化已成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选择。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多样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巨大。在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在南美，绝大多数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在非洲，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是主体。而在亚洲，既有发达国家经济体，又有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经济体。就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而言，亚洲是最为突出的（见表 1-1）。区域一体化的实践证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不仅会影响合作的动机，而且会影响一体化的质量。以东盟为例，20 世纪末中南半岛国家名义上加入了东盟，但在规则的实施方面，老东盟成员与新东盟成员事实上仍处于“双轨”状态，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小的欧盟内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欧债危机

^① 该部分内容取自李向阳《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11 期，第 1~14 页。

也源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南欧国家。换言之，北欧国家与南欧国家之间所构成的“中心—外围”关系成为欧债危机扩大的根源。第二，政治体制多元化。冷战结束前亚洲就是政治体制多元化的地区，冷战后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只有亚洲存在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亚洲，政治体制的多元化曾经是促使东盟产生的主要动因。进入后冷战时代，尽管政治体制的多元化不再呈现出两大阵营相互对抗态势，但它仍然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第三，宗教与文化的差异。亚洲汇聚了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佛教）。无论在南亚、东南亚、中亚还是西亚，宗教与文化的差异对国家关系与区域合作都有明显的影响。第四，历史遗产仍然是困扰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欧洲，一战和二战的历史遗产没有成为战后区域一体化的障碍，而在亚洲这种历史遗产几乎影响到所有的大国关系，如中日关系、韩日关系、俄日关系、印巴关系、中印关系、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等。

表 1-1 部分亚洲国家 2013 年人均收入水平

单位：美元

国 别	人均 GDP（购买力平价）	人均总国民收入（GNI）
新加坡	78, 744	54, 040
日本	36, 290	46, 140
韩国	33, 140	25, 920
哈萨克斯坦	23, 218	11, 380
马来西亚	23, 118	10, 400
中国	11, 874	6, 560
印度	5, 496	1, 570
巴基斯坦	4, 624	1, 380
阿富汗	2, 329	700

续表

国 别	人均 GDP（购买力平价）	人均总国民收入（GNI）
尼泊尔	2, 282	730
亚太地区平均值	10, 279	—

注：按照亚行的传统，亚洲国家没有包含西亚国家。

资料来源：ADB, *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4, pp. 172 – 173。

亚洲发展的多样性致使区域一体化呈现出独有的模式。

（1）亚洲一体化的程度与机制化安排不对称

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范式看，一个地区通常是先签署区域贸易协定（RTAs），然后带来区域内贸易、投资一体化程度的提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相比，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突出特征是，先有结果（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后有手段（签署区域贸易协定）。^① 换言之，在大规模签署自贸区协定之前，东亚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就已经很高了。这是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存在。在这种网络中，产业内、产品内跨国分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提高。受这种贸易投资一体化所驱动，网络内的成员国转而签署区域贸易协定，以规范本已存在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活动。

与其他地区的协议驱动型模式相比，东亚市场驱动型模式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即后者有助于提高国内外向型利益集团的交易能力，为此而

① Nathalie Aminian, K. C. Fung, Francis Ng 曾经对拉美地区与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把拉美模式称为协议驱动型一体化，把东亚模式称为市场驱动型一体化。参见 “Integration of Markets vs. Integration by Agreement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546。

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也更趋向于促进市场一体化。^①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表明：这一结论在微观层面可能是成立的，而在宏观层面有可能相反——过高的市场一体化水平降低了政府签署贸易协定的动力。例如，东北亚（中日韩）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远高于东南亚的水平，但其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远低于后者。实际上，一国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的决策并不完全建立在经济目标之上，很多情况下战略目标是更重要的考虑，对亚洲大国来说尤其如此。

（2）亚洲自贸区的数量与质量不对称

亚洲属于市场驱动一体化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自贸区协定数量少，相反，亚洲自贸区协定的数量多是一个突出的特征。截至2013年1月已经批准的自贸区协定有109个，与2002年相比增加了两倍。此外，尚有148个自贸区协定处于谈判阶段。亚洲的自贸区协定总计达到了257个，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地区。^② 在这些众多的自贸区协定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由此带来的所谓“面条碗效应”。面对众多的、相互交织的自贸区协定，大多数企业并不利用自贸区协定的优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亚洲主要国家企业使用自贸区协定的比例平均只有26%，^③ 即使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东盟内部，这一比例也没有改变。^④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其主要原因在于自贸区协定本身过于复杂，企业缺

① 参见 Nathalie Aminian, K. C. Fung, Francis Ng, 2008。

② ADB,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p. 16.

③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FTAs: Fantastic Fine or Futile? Business Views on Trade Agreements in Asia,” *An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Report*, 2014.

④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FTAs in South East Asia: Towards the Next Generation,” *An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Report*, 2014.

乏利用自贸区的能力，政府提供的自贸区协定的信息不充分，等等。但这些理由的背后实际上是亚洲自贸区协定的自由化程度较低，整个区域缺少统一的自贸区协定，相互交织的自贸区协定都有自己的原产地规则，致使“面条碗效应”突出。

（3）区域一体化推动者与其经济实力不对称

一般说来，区域一体化进程通常是由本地区的大国所推动的，如欧共体的主要推动者是法德，北美自贸区的推动者是美国，TPP的推动者也是美国，南方共同市场的推动者是巴西与阿根廷等。而在亚洲，由于大国之间在非经济领域的分歧，区域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则是由这一地区的小国集团——东盟所推动的。按照新区域主义的理念，由大国所推动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大国基于非经济领域的成本——收益考虑，会在经济领域对小国做出利益让渡。^①也正是这种利益让渡，从而使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掌控协议谈判的进程。在“10+1”的框架内，中日韩三国分别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区协定，这些协定的内容都或多或少地对东盟做出了利益让渡，比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中关于“早期收获计划”的条款。目前，由东盟所倡导的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显然不同于以往的“10+1”框架，东盟是否有能力协调其他六国的谈判立场，进而掌控谈判的进程还是一个未知数。东盟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推动者地位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小马拉大车”。

（4）区域内与区域外大国的影响力不对称

① 李向阳：《新区域主义与大国战略》，《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4期，第5～9页。